

关于文明对话的讨论

[美] 杜维明等

杜维明(哈佛大学教授):各位同仁,诸位朋友,很荣幸有此机会与各位对话。在这里我把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四个问题提出来,请各位批评指正。这四个问题分别是文化中国、文明对话、对西方现代启蒙的反思、儒学创新的可能性。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谈过了。“文化中国”在我的构思中就是从文化的角度来了解中国。从政治、经济角度了解中国非常重要,但从文化角度了解中国也同样重要。从文化角度来认识中国,就会牵涉到文化主体性、文化认同甚至民族特色等问题。西方诸国也都讨论过此类问题。比如启蒙时代的法国,那时伏尔泰、卢梭等人所考虑的问题涉及法国文化认同的问题;德国的费希特(Johann G. Fichte)、施莱尔马赫(Friedrich Schleiermach)、歌德等人对德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进行了一些阐述,当然他们也讨论具有全球性的问题;英格兰的亚当·斯密和休谟(David Hume),以及爱尔兰的一些文学家也都论及相关问题;美国从杰斐逊到爱默生,特别发展了一个叫“美国学者”(“the American Scholar”)的论域,对美国的定义进行了明确的说明;印度从甘地以后,像辨喜(Vivekananda)、泰戈尔等,都对印度的现代转化和印度的民族精神作了阐述;日本的“京都学派”,像西田几多郎、西谷启治也是如此。因此,我们中华民族在目前这个发展过程中,也应该就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、自己的主体性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观点。当然,这些观点应该在文明对话的背景之下展开,应该是开放的、多元的,而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,一种封闭的而且是带有侵略性的特殊主义。比如我们应该超越“二一三四五”的思维方式(这里所谓的“二”是形容以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军对垒;“一”是说只有美国一个超级大国;“三”就是说今天世界的政治格局中有“三极”,即美国、欧盟和东亚[中国、日本];有学者看到现在印度也正在兴起,就在